

论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的关系

项 晨 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作者简介] 项晨光(1971-), 男, 湖北新洲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研究。

[摘 要] 中共五大通过了一系列的蕴含着许多正确原则和科学内容的“议决案”、“宣言”, 为“八七会议”确立新的革命方针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中共五大中的一些“左”右倾观点对“八七会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中共五大; 八七会议; 思想基础

[中图分类号] B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7)04-0606-04

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是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武汉召开的。五大闭幕后2个多月, 大革命就遭到惨痛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 它没有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中共五大第一次强调要争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土地纲领, 第一次强调在南方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强调武装工农, 这为“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 确立实行土地革命与武装起义的总方针, 从而成功地挽救危局, 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八七会议”吸收了五大关于领导权方面的错误教训, 但延续和强化了五大的一些“左”倾观点, 助长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发生。

一

中共五大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批判, 它第一次强调要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提出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 第一次强调在南方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强调武装工农, 为“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决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 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及战略发展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关于领导权

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 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 (第262页)。中共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只是停留在原则和口号上, 五大则第一次强调指出: “现时的革命阶段, 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在斗争之中取得领导权”^[2] (第57页)。

大会批判了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会议认为, 从五卅运动起, 党“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第一个表现就是三月廿日的事变, 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2] (第50页)。大会还批判了彭述之“天然领导权”的思想。瞿秋白指出: 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客观存在, 而且一直在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天然领导权”实际上是拱手把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如不力争领导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3] (第490-499页)。

大会提出了争夺领导权的一些原则和政策: 在原则上, 首先要保证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使他能完全

实现行使其革命的领导权。其次,要以土地革命争取对农民的领导;要争取小资产阶级,为小资产阶级谋利益,同时要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犹豫;要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要加强对青年团、妇女、群众团体的领导,以扩大党在这些群体中的影响。在具体政策上,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以及会后通过了《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等文件,详细规定了对各阶级、团体的工作。

总之,五大不但提出了要争夺领导权,“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这个支配作用也作了明确的指示”^[4](第267页)。尽管这些决议和措施还很不成熟,有些也不切实际,但这对统一全党认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如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发言:“五次大会以前的失败完全由于退守……五次大会即指明此点”^[5](第61页)。正因如此,当“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八七会议”才能够毫不犹豫地实行战略上的根本转变,迅速作出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决断,并再次制定《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重要文件,继续和深化五大实现领导权的具体措施。如果没有五大对陈独秀放弃领导权的批判,“八七会议”要顺利实现战略转变是不可能的。

(二)关于土地革命

五大指出: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根据地都是农村中的封建组织,因此,“中国民众欲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的目的,基本条件就是肃清农村中的封建势力的残余及宗法社会式的政权。急剧的变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国民革命中的唯一原则”^[2](第64页)。同时,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他们自动的自觉的来参加,国民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因此,要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必须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2](第54页),即土地革命。

大会产生了党的第一个土地问题的文献:《土地问题议决案》,比较其中的农民政纲第一、二、三条^[2](第70页)与“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的行动政纲的第四、五、六条^[2](第295页),不难发现,这两个文件不仅在文字表述上,而且在原则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都强调没收公有的和大、中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保护小地主的土地,减租。其宗旨都是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2](第66,296页)。

五大认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必须铲除宗法封建的政权,建立农民的政权。由此,就应使“乡村中之武装势力,必须由绅士手里,夺回来交给农民”^[2](第65-66页)。五大的农民政纲第四、五条决定:取消地主绅士所有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2](第70-71页)。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第一、八条与之比较,两议决案都要求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

当然,“八七会议”在土地问题上比五大更进一步。但后者毕竟是以前者为基础的,正如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发言:“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成立了很好的决议”^[5](第61页)。脱离五大的基础,迅速确立土地革命的方针和凭空去制订一个土地纲领也是不可能的。

(三)关于战略发展方向

五大第一次强调在南方坚持与发展革命根据地。这是针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等的“西北学说”提出来的。大会揭示了“西北学说”的实质就是逃跑主义: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之中发生一种恐惧失败的情绪”^[2](第54页)。会议指出“西北学说”的危害:将经济上最先进最富饶的东南诸省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使资产阶级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巩固他们的势力,以帮助帝国主义更加强固。中国将继续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这就等于消灭革命”^[2](第55页)。大会对“西北学说”的批判是很坚决彻底的。

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南方“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会议决定,为了铲除封建资产阶级消灭革命的企图和巩固革命的胜利,“党有一个目前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地与反动势力作战。这个任务的完成,其意义是在很大的地域上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地域在社会情形及经济上都是合宜的。”^[2](第55页)这样,五大在全党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指

明了斗争的方向,即要在南方去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政权。

正因为有五大对“西北学说”的批判,指明在南方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所以,“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才能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于8月初就制订了《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大纲》,进而在“八七会议”上迅速确立南方四省的暴动和建立工农政权的计划。

(四)关于军事斗争

五大还讨论了重要的军事问题,并指出:要组织农民自卫军,解除反动武装以保障自治政权及革命胜利。认为不但取得土地,就是实行减租也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行^[2](第69页)。会议还指出:“在所有地方都应有普遍发展工人纠察队”来保障民众政权;采用征兵制,备有“相当之常备队。”会议强调,“要使军队革命化,和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大会向工人提出了“到军队中去,拿枪去”^[2](第83页)的口号。这说明党不仅认识到武装工农的必要,还要组织常备军,把工农武装与军队、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相联系。

“八七会议”继承了五大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相联系的基本精神,更明确了党对武装的领导责任和武装的重要性。会议强调共产党现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农民总的暴动^[2](第295页);要“注意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政权”,“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2](第300-301页);要坚决地去“领导四省农民革命高潮,发动土地革命的暴动,推翻四省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2](第307页)。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枪杆子出政权”的精辟论断。

二

此外,中共五大关于通过国民党去实现领导权的主张及其失败,为“八七会议”确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赢得了教训;五大对蒋介石叛变、汪精卫代表的阶级属性和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直接导致“八七会议”“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的滋生。

(一)关于领导权

五大虽然强调要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又主张通过国民党去实现之。五大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到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时才最终实现领导权。但现阶段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此国民党才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无产阶级并非占有革命全部的指导”。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也“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得政权”。但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争取在国民党中的领导权,以达到“强健左派,帮助他领导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民革命胜利,才能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前途^[2](第105-106,116-117页)。这显然是缺乏可行性的。其结果是,为了维护国共合作,陈独秀等人在国民党的反对和进攻下,一味的妥协退让,不仅没能改造国民党,反而使自己成为国民党的尾巴。五大关于领导权的错误主张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高估了国民党的革命性,对汪精卫等国民党领袖的阶级属性作出了定型化甚至错误的判断。“八七会议”在总结教训时认为:五大把小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并且还以这几个上层领袖的意识为转移,对他们的让步失去了我们党的独立性,从而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大大的失败^[5](第51,59,61页)。会议决定将党的工作中心由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转向共产党领导的发动工农群众上来。瞿秋白明确指出:“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5](第71页)。“八七会议”确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

(二)关于阶级判断

五大主观地认为:蒋介石的叛变是代表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2](第73页),因此,现阶段革命是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专政。中国革命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中进行,因而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有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的趋势。对资产阶级的错误判断和非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提出,使得大会在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一次革命论”

的偏差。它支持了在工农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左”的情结^[1] (第236页)。汪精卫叛变后,党又认为上层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这样,革命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八七会议”又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同时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民权革命的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斗争之中^[2] (第256-258页),中国革命有生长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可见,会议已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要把小资产阶级排除于革命阵营之外,并决心集中地打击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瞿秋白在会上更是认为:蒋介石政权不但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还得到封建阶级的帮助。可见,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与封建阶级无大冲突的。因此,“可以去掉以为中国革命分两阶段的幻想”^[5] (第69页)。可见,“八七会议”上,“左”倾思想已在潜滋暗长。

(三)关于革命形势

五大认为:蒋介石的叛变,不足以削弱革命。现在“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2] (第53-54页)。因为封建分子和资产阶级叛变减轻了革命力量自由发展的障碍,土地革命和民主政权的运动可以得到加强。依照这样的思维逻辑,在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情况下,“八七会议”仍然看不到革命处于低潮的事实,而认为反动派的胜利极不巩固,革命的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2] (第332页)。会议不仅对已发生的武装暴动不做总结,还要求各地普遍地进攻及武装暴动,把目标放在夺取大城市上,容许助长了在不利状况下发动工人罢工和举行城市暴动的冒险主义倾向。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3] 瞿秋白. 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C].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美] 罗伯特·诺思,等. 罗易赴华使命[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 [5] “八七会议”[G].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 [6] 李 颖. 从一大到十六大[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5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nd August 7th Meeting

XIANG Cheng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ANG Chenguang (1971-), male,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Law, majoring in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of China.

Abstract: At the 5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 series of documents were established, among them containing many right contents and science principles. They formed the important ideology basis for August 7th Meeting to establish the new revolution policies. Some left-leaning and right - leaning errors from the Fifth National Congress brought about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ugust 7th Meeting.

Key words: The 5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ugust 7th Meeting; ideology basis